

中外音樂家紀念文選

中央音樂學院

庆 祝
中央音乐学院建院
三十周年
1950—1980

究工作，这是很可喜的现象。图书馆的同志们计划逐步编辑一些专题的论文集，应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它为师生们对这些专题的阅读和研究，为专业或业余音乐工作者们的学习、参考，创造了方便的条件。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的同志们在编印这些专题论文集的时候，让我写几句话，我欣然地写上这几句“老生常谈”的话，作为出版的说明。

一九八〇年六月，中央音乐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前夕

搞好图书馆工作， 进一步为教学、科研服务

——出版说明

赵 汎

一个高等音乐院校的图书馆，是一个重要的、必不可缺的教学辅助单位。它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做好图书、乐谱、唱片、录音资料的采集、编目、流通。这一任务的主要环节是编目工作，应该做出科学分类的各种卡片目录，才能方便读者的借阅。

其次，图书馆应该成为学校科研工作的一个重要基地。要能根据教学计划和师生的需要，提供各种书谱唱片资料，即对教师说，要有具有专业能力的馆员，为他们查询、阅读资料提供方便；对学生来说，应该有具有研究能力的馆员，为他们推荐图书，做好对学生进行阅读指导的工作。进一步，图书馆应该进行其它各种研究工作，如汇编或选编各种专题资料，编写各种分类书目，编写各种专题索引，如某一作家、艺术家的著述索引，某一音乐家的研究专著和研究论文索引，某一音乐体裁、音乐专业的藏书索引，某一历史时代的著作索引等等。

现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图书馆，开始逐步进行这些研

目 录

回忆萧友梅先生.....廖辅叔 (1)

纪念王光祈先生.....周 畅 (7)

刘天华——五四时代杰出的音乐家

纪念刘天华逝世二十周年.....李元庆 (10)

谈谈赵元任音乐作品中的创新问题

——为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而作.....汪毓和 (23)

青主与《我住长江头》.....廖乃雄 (32)

纪念黄自先生.....钱仁康 (35)

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先锋

——一九六〇年十月在首都聂耳、

冼星海纪念音乐会上的报告.....吕 骥 (47)

回忆我们的四弟聂耳.....聂子明 聂叙伦 (55)

为革命的音乐事业而献身的光辉战士

——在张曙逝世二十周年纪念音乐会

上的报告.....孙 慎 (66)

革命烈士、音乐家麦新同志.....黄翔鹏 (73)

纪念人民艺术家张寒晖同志.....王玉西 (77)

忆星海.....钱韵玲 (81)

为壮丽的事业谱写最美的乐曲

——记音乐家郑律成……张万象 韩舞燕 (95)
人民不会忘记他

——写在“郑律成作品音乐会”

之后……陈 莲 (102)
悼念安波 学习安波……马 可 (107)
深切感人的革命心声

——马可音乐会观听以后……关鹤童 (114)
深切怀念马可同志……瞿 维 (119)
一位群众所喜欢的音乐家……程茹辛 (125)
忆李元庆同志……李焕之 (130)
悼念李元庆同志……赵 泓 (133)
怀念黎国荃同志……李 刚 (135)
忆沈知白先生……姜椿芳 (142)
忆罗贤宗同志……任 萍 (152)

杰出的民间音乐家阿炳和他的二胡曲……袁静芳 (156)
忆古琴家查阜西先生……李祥霆 (164)

*

*

*

纪念德国伟大的作曲家

乔·弗·亨德尔逝世二百周年……赵 泓 (171)

约·斯·巴赫和他的勃兰顿堡协奏曲

——纪念巴赫诞生二百七十周年……张洪模 (180)

关于莫扎特及其创作

——纪念莫扎特诞生二百周年……张洪岛 (189)

从贝多芬的交响乐中看他的一生

——纪念贝多芬诞生二百一十

周年.....	张洪模 (193)
评舒伯特和他的艺术歌曲	
——纪念舒伯特逝世一百五十周年.....	
周年.....	李应华 (199)
肖邦——波兰人民的伟大歌手	
——纪念肖邦诞生一百五十周年.....	赵 汎 (209)
德国伟大音乐家舒曼的民主进步传统	
——纪念舒曼诞生一百五十周年.....	喻宜萱 (218)
格林卡——俄罗斯音乐之父、俄罗斯人民的灵魂	
——纪念格林卡逝世一百周年.....	吕 骥 (227)
纪念匈牙利伟大音乐家李斯特.....	江定仙 (241)
“全靠自己救自己”	
——纪念无产阶级第一代歌手鲍狄埃	
逝世七十五周年，狄盖特逝世三十周年.....	廖辅叔 (251)
比才和他的歌剧“卡门”	
——纪念比才逝世八十周年.....	张洪模 (257)
论柴可夫斯基.....	钱仁康 (267)
纪念里姆斯基——科萨科夫逝世五十周年.....	赵 汎 (280)
法国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	孙幼兰 (288)
意大利近代杰出的歌剧作家	
——纪念普契尼诞生一百周年.....	张洪岛 (293)
意大利歌唱家卡鲁梭.....	蒋 英 (298)
纪念俄罗斯歌唱家——夏里亚平.....	郑兴丽 (303)
论巴托克的创作	

- 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科学院第二届
国际音乐学会议上的发言……赵 沅 (309)
- 歌声帮助我们建设和生活
- 纪念И·杜那耶夫斯基诞生六十
周年……吴祖强 (319)

回忆萧友梅先生

廖 辅 叔

辛亥革命以来，象萧友梅先生那样把音乐教育当作安身立命的事业，而且始终如一，到死方休的，算起来人数并不多。同他一辈的人物，如李叔同，曾经是创作新歌曲的开山，到了五四运动前一年，就已经在杭州虎跑寺做了和尚；王光祈，新文化运动以后研究中国律学和音乐史的专家，到了抗日战争前一年，就已经客死德国波恩。他们活动的时间都不及萧先生那么长，社会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盖棺论定，萧先生可真够得上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首屈一指的人物。当然，由于中国社会飞速的发展，到了后期他已经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但是饮水思源，萧友梅还是值得我们纪念的。听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中华民国史》将要为他立传，这篇回忆性质的小文章就算是萧传的参考资料吧。

香山萧家先前该是一个大族，我看过先生老家的一张照片，那是一座楼房，里面可以住上不少人。但是后来似乎中落了，所以萧先生留学日本的那段时期，在他考到留学生官费之前，要靠翻译来挣点生活费。那是这样的一种翻译：日本教师在那里讲课，他站在旁边跟着翻译。因为当时“大清帝国”的许多留学生，根本听不懂日本教师的话，必须花钱请一个翻译来传话。民国初年，他去德国留

学，一开头就是官费生，生活应该富裕一些了。但是他的家庭不同意他出国，因为他有维持家庭生活的责任。解决的办法是他留学之后，要把官费的一部分节省下来，寄回中国去补贴家用。因此他在德国留学时期生活总比一般留学生俭朴。听我的哥哥说，他当时是在修道院里面租用一个房间，房租比城市住房便宜，又可以安心读书。中国从前的读书人为了安心读书，常常是寄寓在庙宇里面的。想不到萧先生出洋留学，依然继承了这个传统。

一九〇六年萧先生加入同盟会。由于孙中山先生的活动已经受到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的注意，随时有被追捕的危险，萧先生的住处因此成为同盟会的联络点。萧友梅是学音乐的，与政治可以说没有什么瓜葛，可以避开暗探的狗鼻子。据说孙中山先生与廖仲恺先生一班人开会的时候，萧先生实际上不可能象其他革命家那样指天划地，审时度势，于是萧先生就站开一边，抱弄廖先生的孩子，以便他们专心筹划革命大计。经过实践的考验，孙中山先生很欣赏萧先生的为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他即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他的书房里一直摆着一张孙中山亲笔题着“友梅先生惠存”的照片。

德国大学生有一种传统的自由主义的习气，通称为“学院一刻钟”，意思是迟到一刻钟进入课堂不算迟到。我们的萧先生却利用这一时刻钟让教师当面修改他的作业。他那种爱惜时间的习惯是处处表现出来的。一九一六年他考取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之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打得难解难分，海陆交通都陷于断绝状态，他不能立即返回，于是又转到柏林大学听课，并在施特恩音乐学院

研究作曲、配器、指挥及古谱读法。他真的是把别人上跳舞厅、咖啡馆的时间都用到研究工作上面去了。

要在旧中国推广音乐教育，萧先生具有善良的愿望，至于促使他的善良愿望得以实现的，则是主张“以美育代宗教”的蔡元培先生。早在一九一六年蔡先生接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就在北大成立了音乐研究会。但是真正谈得上发生相当社会影响，却是由于萧先生提议将音乐研究会改为音乐传习所之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还组织了一个管弦乐队。这个管弦乐队，说寒碜是够寒碜的，全体成员只有十七人，其中有些人还是从前海关总税务司遗留下来的，但总算是我国人自己组织的管弦乐队，而且向群众介绍了西洋的器乐曲，甚至于交响乐。有一次徐志摩给学生讲英国诗人济慈的《夜莺歌》，认为学生“没有听过夜莺就是一个困难”，为了让学生得到一点对夜莺的实感，他建议大家去听萧友梅先生指挥的贝多芬的第六“沁芳南”（交响曲）。这在当时真可以算得是空谷足音呢。关于萧先生的作品的影响，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是一九二一年中国留法学生因反对中法反动派互相勾结，出卖中国国家利益，被法国反动军警逮捕的时候，陈毅同志在狱中高唱《卿云歌》，借以表示中国人独立不屈的气概。这首《卿云歌》的作者正是萧友梅。虽然这首歌被北洋政府选定为“国歌”以及其后出现的一些情况，使得对于这首歌的客观效果的评价成为一个较复杂的问题。但陈毅同志当时高唱这首歌曲是用作战斗的武器的，这说明这首作品有其积极的社会作用的一面。

萧先生对中国音乐的贡献，主要是在教育方面，创作

仅居次要的地位。他创作的旺盛时期是在一九二〇年初到北京到他同时兼任北京几个大学的音乐系主任那几个年头。当时国内创作的新歌是很少的，为了教学需要，他往往是随写随教。一九二二年他的《今乐初集》和《新歌初集》先后出版，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新耳目的盛事。虽然这些歌曲，特别由于那陈旧以至俗滥的歌词，加以在作曲技术上也不无可议之处，今天大都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如果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看一看，这是将近九十年前编印成册的新歌，而且想一想新文学运动初期，胡适的《尝试集》也曾经算是呱呱叫的新诗，两相比较，似乎也不必求全责备了吧。至于他在教育方面最快意的一件事则是他经手创立了中国第一个音乐院。过去他虽然身兼数职，总不免是寄人篱下，甚至于引起别人的讨厌。实际上音乐这一门在当时的高等学校里面不过是附庸的附庸，有的称为图音系，有的称为音体系，有的还称为图工操唱。经过他的努力，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音体科终于两科分立，然而究竟还不能说是理想的专业教育机关。只有开办了独立的音乐院，才可以放手去干。但是说起来可怜，堂堂音乐院一个月经费只有三千元，一年之后，几经交涉，才增加到五千元，因此精打细算是做得相当彻底的，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教务主任加一个注册工作人员就是教务处。图书馆从采购、编目到出借全由一个人包办，当然更没有文化书、乐谱、唱片的分工，同时还要向德国定购乐谱，兼管代售，还要抄乐谱。虽然是穷打算，说到精兵简政，倒也是值得参考参考的。

要办好音乐院——后来又改为音乐专科学校，需要有

一个得力的助手，即教务主任。最初萧先生想延聘青主担任这个职务，不久，黄自从美国回来了，这才改变了主意。聘请黄自，还因为黄自与黄炎培的关系，遭到国民党一些人的反对，只是由于蔡元培的点头，才算定局。也可见他处理事情总是出于公心，与蔡先生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是一致的。

音专五周年纪念刊编印过一张“学生家长职业比较图”，“商”的比例几乎占了一半，这显示出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的特色，对发展音乐教育来说是不相适应的。相当的一部分人，特别是有些女学生，来学的目的并不是放在音乐事业上。萧先生曾经感慨地说，一个学生在音专上了几年学，领到一张证书，只是添了一份嫁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萧先生出了一个主意，发函各省教育厅，每省保送音乐学生若干人来音专学习，毕业后回原地方工作，以便促进各省音乐教育的发展。这样一来，“富丽堂皇”的高等音乐学府也有了远自边远省份来到上海的“土包子”。当然，不经过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点点滴滴的改良决不能改变中国音乐教育的落后状态，更不能改变音乐教育的根本方针。时代的局限，阶级的局限，使先生不可能找到更好的办法。

“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对外不抵抗，把祖国的大好河山拱手送给敌人；对内却借口国难，加强他的法西斯统治，派遣军训教官进入各学校。眼看他惨淡经营的学校有人插手进来了，他老先生还想抵挡一下，结果当然挡不住。最后他向国民党教育部打一个秘密报告，请求调走这个军训教官。这是我替他起草的唯一的密件。报告上去，

一直没有下文。哪里会有下文的呢？这简直是“与虎谋皮”！

一九三六年日本乐队指挥近卫秀麿来上海指挥那个外国人的管弦乐队，并来音专参观。为了表示“亲善”，他提出回国之后要送一架钢琴给我们。过了一些时候，我们收到日本领事馆的一封信，说近卫秀麿送给音专的钢琴已经运到了上海，请我们去商量交接手续。萧先生的答复却是拒绝接受。抗战期间汪精卫逃出重庆，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组织伪政权，听说也曾企图拉先生下水。因为我早已离开上海，说不出什么具体情况，只知道他始终在孤岛上维护着那所风雨飘摇的音专，一直到他逝世，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记得从前上海有一家自来水笔公司曾经约请各界名流用它的产品题字，并把这些笔迹汇印成册，证明它的金笔特别适用于写中国字。其中有一张是萧先生写的，写的是于谦的《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作为近代中国辛勤创业的爱国的音乐教育家，他是体现了于谦这首诗的精神的。

（原载《人民音乐》1979年5月号，

选载时个别地方作者略有改动）

纪念王光祈先生

周 畅

王光祈先生遗下不少著作，后辈的人阅读起来，感到喜悦，然而，也有几分隐痛，因为王先生离开我们太早了。

今年（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是王光祈先生逝世二十一周年纪念日，我们要纪念他，因为他曾对中国音乐科学有过贡献；他在学术上获得了丰富成果，我们要学习他的治学态度和热爱祖国文化传统的精神。

王先生于一八九二年诞生（一说是1891年），一九二〇年留学德国，最初学习政治经济，后来才改攻音乐。他在留学时期，既非官费，又无朋友任何资助，全靠自己写文章维持生活，经济十分窘迫。然而，仅十年上下的时光，他贡献给祖国的学术论著，却在十五种以上。

在他所著的《中国音乐史》一书中，对于中国音乐的“律”的起源和进化，对于各种“律”的学说，作了详细的介绍和评论，根据近代西欧的数学科学和物理科学的成果，对各律的“颤动数”作了初步的试验和演算。以上各点，虽然其中有些意见还不能作为科学上的定论，然而，其中有不少见解，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同书中，对中国音乐历来关于“调”的理论，做了较详细的考查。关于乐谱和乐器的进化、歌剧和器乐的进化也都有所

阐述。王先生对历来中国关于乐制的理论加以整理，是有相当功绩的。

为了中国现代音乐家能更好地认识中国古代音乐，从而更好地创作现代中国音乐，按王先生的话来说，是创作含有“民族性”的“国乐”，王先生著有《翻译琴谱之研究》，对古琴音乐的研究也是有帮助的。

王先生所著《东西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在这以前，清人李映庚著有《中外字谱表及序》《中外律吕表及序》《中外律吕旋宫表及序》，民国杨昭恕也有短文《中西音律之比较》等）中创用了“调子音阶组织”的方法，来对世界乐系进行了分类的研究，姑无论这种方法是否完善，然而，对研究世界乐制，这无论如何都算是一个重要的方法，是值得我们研究各种乐制时作参考的。

王先生所著《欧洲音乐进化论》、《西洋音乐与诗歌》、《西洋制谱学提要》、《西洋乐器提要》等介绍了有关西洋音乐史，音乐理论中的主调、和声、曲式、乐器、乐队等方面的知识，对音乐知识相当贫乏的二十年代的我国青年是有过不少帮助的，就是现在的音乐青年，也能从中得到许多知识。

王先生的著作还有《中国古代之歌剧》（此系王先生得波恩大学博士学位的论文）、《中国诗词的轻重律》、《西洋音乐与戏剧》、《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各国国歌述评》、《对谱音乐》等。当然，由于种种的限制，在王先生的著作中还有许多值得商榷和有待研究的看法和问题。

王先生是一位勤劳、刻苦的学者，十年的时间就给我

们留下了十五种以上的学术论著和其他短论。由于过度的勤劳他曾晕倒在柏林大学的图书馆。这种勤劳刻苦的治学精神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

王先生治学态度是认真不苟的，在翻译几首古谱时，他自己曾说过：“在个人经济情形万分压迫之下，用去数月心血。”“往往为译一个名词，每在公园内踱来踱去，费了半天功夫，才想出来，但是有时还不能满意。”我想这里面并没有丝毫夸张的成分。

王先生是一位谦虚谨慎，实事求是，而又能勇于纠正自己的人。他把自己全部劳作仅仅看成是“开个头”，常说“难免有错”，“希望国内同志继续研究”，“继续改正”。翻开他的著作，常常可以碰到这样的话：“以待他日再为考证也。”“他日尚当重考。”“凡此种种，皆非余所能误解者也。”因为不断地占有丰富的材料，而常常纠正自己以前某些错误的论断。象这种谦虚的和勇于纠正自己的精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也是我们应当效法的。

王先生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是十分鲜明，他曾把那些认为祖国文化遗产一钱不值的人称为“入于疯狂状态的中国人”；王先生又说“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从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因此之故，慨然有志于音乐之业”（均见《东西乐制之研究》自序）。这些闪烁着爱国主义的光芒的话语，至今也会使我们激动。我们纪念王先生，不要做王先生称之为“入于疯狂状态的中国人”，而要把祖国的优秀的文化遗产发扬光